



〔美〕约翰·多恩伯格著

DONGOU-

东欧—共产主义的万花筒

GONGCHANZHUYI DE WANHUATONG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东欧——共产主义的万花筒

〔美〕约翰·多恩伯格著

楼小燕 柯国淳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EASTERN EUROPE: A COMMUNIST KALEIDOSCOPE

JOHN DORNBERG

根据美国 DIAL PRESS一九八〇年第一版译出

东欧——共产主义的万花筒

〔美〕约翰·多恩伯格著

楼小燕 柯国淳 译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印张7.875 字数170,000

1984年1月第一版

1984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500

统一书号：3103·208

定 价：0.81 元

【内部发行】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译者前言

本书作者约翰·多恩伯格 (JOHN DORNBERG) 出生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七岁时随父母移居美国，在科罗拉多的丹佛长大。他曾就读于丹佛大学，在美国陆军服役两年后，开始在欧洲从事记者工作。他曾任美《新闻周刊》驻维也纳和莫斯科分社主任。因撰写有关苏联不同政见者的主张的文章，于1970年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他的著作《两个德国》和《今日苏联》曾受到西方世界高度评价。多恩伯格现在侨居联邦德国，是一位资产阶级作家和苏联、东欧问题分析家。

本书所介绍的东欧，是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对于地处东欧的民主德国和南斯拉夫，作者另有著述。东欧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当今的全球战略格局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东欧对我们来说还是一片陌生的土地。特别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后，我们和东欧几乎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以及近年的波兰工潮，使我们透过半启的门窗瞥见东欧的一隅，但对于世界这一地区的详情仍是一知半解。

约翰·多恩伯格的《东欧——共产主义的万花筒》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不少资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东欧问题。作者长期从事东欧问题的报道，积累了大量历史的和现实的材料，比较客观地肯定在共产党执政之后这些国家在各方面取得的成绩，

也指出了它们目前存在的问题，对我们有参考价值。

作者认为，东欧是“世界上最色彩斑斓的地区之一”，是“各种民族、种族集团、语言、方言、宗教、文化的万花筒”，是“充满差异的世界”。因此，如果把东欧各国看成是铁板一块，“这不仅把事物简单化了，而且在过去的年代里，导致了美国的决策人物在估计上的严重错误”。

基于这种认识，作者逐一分析了东欧五国的历史和现状，介绍了它们的特色。它们同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所走的道路却各有不同。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看这个“共产主义的万花筒”，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大千世界，那里有惨痛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对于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的中国人民来说，东欧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是值得借鉴的。

当然，作者是个西方新闻记者，他戴着资产阶级的有色眼镜看东欧。他的有些观点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偏见，有的则是完全错误甚至是反动的，这在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和计划经济制度等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对有些现象作了冗长的记述。对此，我们作了少量删节，但保留他的观点。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本书译文在匆忙中赶出，加上译者水平所限，错舛之处一定不少，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译者 1983年6月

目 录

译者前言

第 一 章	一个充满差异的世界	1
第 二 章	东欧地图——一幅碎布块 拼成的被面	17
第 三 章	一口沸腾的大锅	25
第 四 章	历史的回顾	43
第 五 章	美梦变成恶梦	69
第 六 章	并非革命的革命	83
第 七 章	外套和拘束衣	103
第 八 章	五位领导人	122
第 九 章	将来有一天……	137
第 十 章	更多的土豆烧牛肉	156
第十一章	一个采访者的札记	166

第十二章	东欧的新一代	179
第十三章	未来的革命	193
第十四章	一个并不完美的社会	204
第十五章	上帝没有死	215
第十六章	值得深思的问题	226

第一章 一个充满差异的世界

那是1968年2月，在维也纳。我在那里担任一家美国杂志的办事处主任，报道东欧国家——主要是苏联集团的五个“卫星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情况。我即将被派往莫斯科，接替我的艾伦·蒂利尔已抵达维也纳，我在莫斯科的前任巴德·科伦戈尔德也来到了这里。我们三人驱车前往离中立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一百八十英里的布达佩斯——共产党匈牙利的首都。我们是去采访大约三十五个国家共产党官员的一次高级会议的，对我们外国记者来说是例行公事，但对我们三人来说确实是一个互相了解和交换看法和经验的好机会。

我对布达佩斯很熟悉。由于需要报道这一地区的情况，我常去那里。在我眼里，它仅仅是又一个共产党国家的首都。

然而对我的两个同事来说，这却是一次新的体验。迄今为止一直在巴黎工作的蒂利尔从未到过任何共产党国家。在苏联干了八年新闻工作的科伦戈尔德对莫斯科了如指掌，却也从未访问过苏联集团的其他国家。他们就象两个来自不同星球的人那样来观察布达佩斯。

当我们驰入市区时，我看到坐在我身旁的蒂利尔的表情越来越阴郁和严肃，而我从反光镜里看到，科伦戈尔德的精神却开朗了起来。他们两人都在细细地观察周围的环境。

我们终于到了位于熙熙攘攘的列宁大街上的旅馆。蒂利尔沮丧地摇摇头说：“唉！一切都是那么单调乏味。难道要我在这儿工作上几年吗？”科伦戈尔德的反应则截然不同，他跳出汽车，高兴地做了一个舞蹈似的动作，大声喊道：“天哪！真棒！那么多的商店和霓虹灯。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也是共产主义。”

这件事在我脑子里一直记忆犹新，如同昨日。它很好地说明了东欧的某些差异和矛盾。

东欧人口近九千万，相当于美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强，但相对而言面积较小。挤在德国和俄国边界之间的五个独立国家，一共是三十四万四千平方英里，略大于得克萨斯州，但比阿拉斯加州小得多。

对东欧的政治、历史和文化的影响不能低估，对美国来说，其影响尤为重要。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这里爆发的，第一次在1914年，第二次在1939年，它曾是大国争夺和显示实力的地盘。不仅如此，而且东欧还是美国 and 苏联之间从四十年代末期延续到七十年代初的冷战的主要舞台。还有，近五百万美国人不是出生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就是来自这些国家的第二代移民。至少还有五百万美国人的两代以上的祖先来自东欧。

可是，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东欧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那里居住着名字非常拗口的人民，地图上的平原、森林、山脉、河流、城镇、乡村的名字也同样拗口，他们的语言，除了他们自己，其他地方很少有人会讲或听得懂，他们的风俗习惯也很奇特。

近年来，世界上很少地方象东欧这样被人误解或曲解，也很少象东欧这样被大肆宣传，写下了许多有关它的荒谬的

文章。

的确，三十多年以来，共产主义是东欧各国政治和经济的共同特性。它们都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军事上的对立面——莫斯科操纵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也是经济互助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它们完全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程度要比西欧国家对于美国的依附严重得多。

但如果把它们看成是铁板一块，完全按克里姆林宫的调子行事，那不仅是把事情看得简单化了，而且在过去的年代里导致了美国的决策人物在估计上的严重错误。事实上，这一地区是世界上最色彩斑斓的地区之一——一个各种民族、种族集团、语言、方言、宗教、文化的万花筒，它们之间的差异要比西欧各国之间的差异更大。

一方面，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三国人民都属于斯拉夫民族，然而一千年以来这些斯拉夫民族却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历史、宗教和文化。波兰人信奉天主教；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保加利亚人信奉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他们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仇恨；他们的语言比德语、荷兰语、瑞典语之间的差别还要大。其中，保加利亚文甚至使用完全另外一种字母。

另一方面，东欧第二大国罗马尼亚的人民基本上是拉丁民族。他们的祖先是基督前的达契亚人和公元106年前后攻克了古达契亚后在那里定居的古罗马皇帝图拉真的军团成员。罗马尼亚文和意大利文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同罗马尼亚的一些邻国——苏联、匈牙利、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语言则完全不同。然而，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信仰却是东正教。匈牙利是五国中最小的国家，但也是最富足的。匈牙利人属于马扎尔民族，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与马扎尔民族在历史上和语言上最接近

的也许要算一千英里以北的芬兰人了。)

在以往的年代里，这五个国家的边界一再变更，而且象一个筛子那样不严密，所以今天在罗马尼亚有不少匈牙利移民，在保加利亚有土耳其人，在匈牙利有斯洛伐克人，在波兰有捷克人，更不用说在东欧各国都有日耳曼殖民者的后裔了。

苏联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的确重压在它们头上，但是，实际情况却与冷战宣传和一些带成见的描述不完全一样，苏联的威力还不足以把这些国家称之为仅仅是苏联的附庸或“卫星国”。六十年代初期，我作为新闻工作者开始报道这些国家时就得出这一印象，今天这一印象则越发深刻了。

我和我们这一代人的大多数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们还太年轻，因此未能参战，但冷战开始时，我们长大记事了，我还记得英国首相邱吉尔1946年3月访问美国时在密苏里州的富尔顿所作的一次戏剧性的演讲。

他说：“最近被盟军的胜利点亮了的舞台上笼罩着一个阴影。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的整个欧洲大陆上，降下了一块铁幕。”

在我被派往东欧当记者后，我开始寻找那个久有耳闻的“铁幕”，但是我没有完全找到，直到我去莫斯科，开始报道苏联时我才真正找到了“铁幕”。形象地说，“铁幕”是沿着苏联边界展开的，那是一条文化和观念的帷幕，是一条心理上的帷幕。建起这道帷幕更主要是因为以往的十个世纪中，俄国脱离了欧洲历史的主流，而不完全是由于1917年的俄国革命或由于苏联是共产党国家。然而，这条边界以西的“卫星国”——尤其是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当然也包括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过去却是这个主流的一个部分，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如此，尽管它们被苏联控制了三十年。此外，它们

认为自己在文化上仍比俄国人优越，虽然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它们依附于俄国。

也许正是以上这些原因，使我的两位同事科伦戈尔德和蒂利尔在1968年2月的那一天第一次看布达佩斯时的反应是如此地不同。

按照美国和西欧的标准，这些国家是贫穷落后的，因此蒂利尔认为“单调、乏味”也不无道理。

大部分较大的城市看上去都是暗淡的。所有第一次访问东欧的人们的印象是建筑物和住房缺乏修缮和管理，建筑质量低劣，以至一些新的公寓和居民点在住户搬进来之前就已成为贫民窟了。城市缺少色彩或欢乐，而且，由于经常性的能源短缺和没有美国人、西欧人看惯了的各种霓虹灯广告，晚上显得黑洞洞的。举几个统计数字为例：在东欧，每六个家庭才有一辆汽车；半数家庭有冰箱；按人口比例算的话，电视机数量只有美国的一半。

此外，东欧人民必须更辛勤地工作，延长劳动时间才能维持一种比西方低得多的生活水平。例如，一般的匈牙利人必须比一般的美国人工作时长三倍——多工作四十五分钟——才能挣到买一磅牛肉的钱，比一般西德人也至少要多工作十分钟。按劳动时间计算，和美国人比较的话，买一套男人西装需要多花三倍时间，买一套妇女连衣裙多四倍，彩色电视机多十倍，小型汽车多六倍。

而且整个东欧的消费品的品种和供应极为有限，存在的问题不是手头没钱（赊购货物的办法几乎不存在），而是货源不充足。有些商品永远是短缺的，而有时所有的商品都缺货，——甚至连普通的日用品如大头针、缝衣针、橡皮筋、文具、手纸和厨房用具等也缺货。

例如，1977年到1978年初波兰的肉类奇缺，我在华沙和其他城市到处看到人们在肉店门口排着长队，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肉类的缺货甚至引起了罢工和暴乱，至于含着辛辣讽刺意味的笑话则更不在话下，人们公开而大胆地讲述着这一类笑话。我曾经听到这么一个笑话：一个男人在买肉的长队里已站了一个多小时，他越站越着急，越冒火。突然，他转向身后的一位妇女说：“气死我了，我再也忍受不了啦！你能不能替我占着这个位置，我去一下党的总部去给爱德华·盖莱克（波兰共产党的头目）鼻子上来一拳。”这位妇女点点头，他就气鼓鼓地去了，但没过几分钟他又回来了，比去时火气还大。“怎么啦？”妇女问道。“简直不能相信，盖莱克办公室外面的队排得比这条队还长。”他回答说。

按照苏联的标准，东欧各国是很富足的，所以科伦戈尔德在到达布达佩斯后从车里出来时说“真棒”也是对的。他在莫斯科工作了那么多年，他是以俄国的眼光来看待东欧的。

虽然一个普通的匈牙利人必须比美国人或西德人多干许多工时才能买到一磅牛肉，但是他却可以比一个普通的俄国人少干十五分钟。进行对比的话，苏联公民要比匈牙利人多劳动两倍的时间才能买得起西装、连衣裙、电视机或汽车；而且苏联商品的质量、花色品种和供应也要差得多。

对大多数苏联公民来说，到东欧任何一个国家去访问，都是终生难忘的事，简直可以说是上天堂。在东欧的一些城市里，我经常观察坐在旅游车里的俄国游客并偶然听到他们之间的谈话。他们象一群在圣诞节前夕站在玩具店外面，把鼻子紧紧地贴在橱窗上的孩子，贪婪地看着熙熙攘攘的街道，川流不息的车辆，衣着比他们考究的行人以及更为繁华的景象。这儿有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有着比苏联高得多的生活水平和更

多的个人自由，面对这一切，他们的惊讶或羡慕之情溢于言表。

象许多美国人第一次访问西欧，尤其是其中最富裕的西德一样，我经常听到这些俄国人在东欧表示愤懑，他们大声地说：“好象是他们，而不是我们把仗打赢了似的。”我们必须记住苏联集团中的三个国家——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纳粹德国的盟国，和俄国是交战国，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是在被德国人占领后，又被苏军解放的。

但是东欧的经济和生活水平不能单用美国或俄国的标准来衡量或对比。更有意义的检验是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们成为共产党国家之前的情况与今天的生活进行比较。

当时只有一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工业高度发达，至少在西部的捷克语区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是这样；然而在斯洛伐克——那里的人讲一种与捷克语相近但又不同的语言——却是以农业为主。

在其他几个国家，主要是保加利亚、波兰和罗马尼亚——匈牙利稍好一些——社会落后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人数很少的城市工商业者阶级和农村地主阶级统治着绝大多数贫困、不识字、生活悲惨的农民。工业几乎不存在，农业还很原始，马和人仍是主要劳动力，没有任何机械化设备。

自从共产党掌权以后，特别是六十年代初以来，面貌完全改变了。在保加利亚，直到1945年，农业依然采用中世纪的耕作方式，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近百分之八十。而今天，从事工商业的城市人口已占百分之六十。罗马尼亚也在经历着类似的变化。

最令人吃惊的是波兰。波兰的面积大约与新墨西哥州相等，

但却有三千四百万人口，几乎相当于美国的伊利诺斯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的人口总和。它是五国中人口最多的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比其他国家遭受更大的损失，六百万波兰人牺牲了。大战以前，它是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三分之二的人口靠种地吃饭，勉强能够糊口。

今天，波兰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从事工业和贸易，波兰已成为欧洲第七工业强国，在世界上居第十一位。它的优质无烟煤的产量居世界第四位，出口量居世界第二位，纯铜的产量居第五位。波兰还是钢铁、化学品、合成纤维、机床、机械产品和电子设备的重要生产国。它是欧洲拥有最大的商业船队的国家之一，在造船业方面占世界第九位，和那些传统的航海国家，如英国、意大利、法国、挪威或瑞典相比，遥遥领先。自1971年认真实行工业化以来，波兰成了世界上一个最大的、无可比拟的工地。农业实现了现代化，马拉的大车和犁杖——当我1967年第一次访问波兰时，这两样东西几乎等于波兰的商标——逐渐由拖拉机和其他农机所取代。

和其他东欧国家一样，波兰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许多新的建筑物粗制滥造，因为建筑速度快，工人缺乏训练，新建成的公寓房子的确很快就变得象贫民窟一样了。刚通车的公路已象出过天花似的布满了坑眼。从传送带上新出厂的小型意大利式汽车是每个波兰人都渴望驾驶和乘坐的，但是噪音却大得象卡车。这是实行数量第一、质量第二的结果。此外，波兰人为了显示自己的工业实力和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国家的能力，只好放弃大多数欧洲国家所具备的舒适的生活条件。西方的客人如果用他们本国的标准来衡量的话，那当然要感到惊讶。然而，这是预料之中的。

我始终不解为什么那些可以给生活带来更多方便的高质量的商品和许许多多小商品仍是供不应求。我已认识多年的波兰某城市的市长有一次对我说：“问题很简单。‘甲’总是在‘乙’前面。在我们这里消费品是‘乙’类，生产资料是‘甲’类。但是，我相信自从你上次访问以来，你一定注意到情况有了变化。”我当然注意到这一点了。

尽管东欧国家的经济状况参差不齐，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生活水平高于波兰，而波兰又高于保加利亚或罗马尼亚，但是这些国家中大部分人民的生活显然比共产党执政前要好。人们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鉴于全世界的生活水平都已普遍提高，那么，如果东欧各国没有成为共产党国家的话，生活水平到底能提高多少？然而历史的道路已是如此，答案也就无从找起了。

温斯顿·邱吉尔在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创造了他那著名的“铁幕”一词以后至少也有二十年了。从那时起，西方一直把东欧看成是一个大监狱，九千万老百姓胆战心惊地在共产党压迫下生活。人们描绘出来这样一幅图画——它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也许大体准确，但今天已不再是这样了——只要莫斯科一挥舞鞭子，“卫星国”就都会摇尾乞怜，他们在苏军的控制下过着几乎是奴隶般的生活。美国国会在1959年甚至通过了一项决议案，其中把东欧各国说成是“被奴役的国家”。根据这项决议案，美国总统至今每年还须宣布什么“被奴役国周”。

事实上，这些国家并不认为自己是“被奴役”的国家，而且嘲笑这一标签，这种提法似乎是把它们在被纳入苏联的轨道之前说成是“自由”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捷克斯洛伐克极其特殊，因为自1918年独立直到1939年被希特勒占领和肢解以前，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国家。而其他国家在共产党掌权